

“扎台型”这句话在上海流行了很久,至今未被淘汰,可见其生命力旺盛。台型传达的是什么语义?台型在上海人的理解里一般指的是门面、面子。打人不能打脸,做事要给人留面子,这是人之共识,上海人当然也把手面看得很重。风头健的,上海人称之为有头有脸,有困难,朋友肯出手帮忙的叫做面子大。为人行事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就是穿着打扮也以头面部为重点,不仅头势要清爽,面孔也要光爽,而谈吐举止也要和穿着打扮相协调。“扎台型”在定义上说很难定义为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如果说“硬扎台型”或者“死扎台型”,那是带有贬义的,明明肚皮里啥货色,明明心里也自觉没理,却偏要嘴上硬撑,煮烂的鸭子嘴还硬,就是一个死扎台型,嘴硬骨头酥的主儿。旧上海在十里洋场里,为了让人看得起,即使生活再寒酸,卖相还是要的,即使肚皮里瘪瘪塌塌,屋里穷得叮当响,也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哪怕被人背后称之为洋装瘪三也只能硬撑到底,如此硬扎台型的做法,是只认长衫不认人的文化环境逼出来的。

扎台型这句话,在不同的语气语调里有时是褒义,有时却是贬义,犹如北京人口中的一声“你大爷”一样,语调一变化,意思随即变化。北京人听得懂,外地人未必明白,“这桩事体伊台型扎足”,倘若语气平缓,那多半是肯定。“依扎啥台型?”,这样的反诘句一出,基本上就是贬义了。“台型有哦,腔调有哦?”,这是激将法,有时是激发人做有担当的模子,有时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挑人上山看白戏。可见扎台型这句话在人们的语言交流中好像下饭小菜里的甜面酱辣火酱一样,有不可替代的调味作用。

同样是要面子争面子,上海人的扎台型也有自己的特点。对于那些家底殷实或才貌兼具,原本有台型的人而言,有的尽管不屑于显山露水,但旁人还是会觉得其掩饰起来的台型;而有的不愿意锦衣夜行,喜欢不时“豁胖”,出出风头的,旁人对其锋芒毕露的台型不一定买账,可能会装作视而不见,让它像空气一样飘过。所以平时生活里,不自量力,野豁豁扎台型的并不多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戴副太阳镜,却让商标像烂膏药一样留在镜片上,西装明明已经穿旧了,袖口上还飘荡着一条长布条的人;出门谈生意,一落座,把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手机往台上一竖,万宝路香烟朝台上一甩的人固然可见,但在上海人眼里只是觉得触气。相反,那种低调含蓄,好似漫不经心的扎台型好像更符合上海人的胃口。那时社会生活里较有代表性的画面,是将万宝路香烟放在的确良白衬衫上面的口袋里,让红壳子时隐时现,表现了想扎台型又怕被人奚落的小心思。单卡双卡录音机刚从海外流入上海时,马路上不时可看到赶时髦的人手提一只三洋牌机器,将音量调到最高档,神抖擞地招摇过市。由于当时文化生活匮乏,路人对这种扎

上海人的「扎台型」

羊郎

台型倒也不甚反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MP3等新玩意出来后,再拿录音机到马路上招摇就变成了“瞎扎台型”,显得不那么“懂经”了。上海人中死要面子活受罪,死扎台型的人不多,而觉得做人要维持基本面子的人却不在少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可谓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家户户生活不宽裕,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人情往来必不可少,所谓人情大如债。那时要表示人情随礼,细心思实的上海人选择礼品,首先一定是符合自己的经济实力,绝不会硬扎台型,宁可有限的钱财买一件最贵的小礼品,而不会用本就不多的钱财去买一件最差的大礼品,这不是面子问题,是智商问题。过去,家里子女结婚,男方准备家具,基本台型是要有三十六只脚,女方准备床上用品,至少要有四床棉被,否则就失去了基本脸面。厂里的小学徒,十七元八角四分的学生工资苦攒三年,买一辆永久或凤凰脚踏车也算是有点台型。刚满师的小青工一旦都有了心爱的脚踏车,为了让自己的坐骑多一点台型又不至于超出经济能力,于是就给脚踏车装一个全链罩,再一个有流苏的花垫子,这种台型性价比。上海人穿的补丁衣服也是俭而不陋的,补丁一定是衬贴在里面,针脚一定是细细密密,整整齐齐,符合当时的审美观。可惜那时有洞洞眼的乞丐牛仔裤没有流行,否则上海人何苦在15支光暗簇簇的电灯泡下面讲究补丁针脚呢。

当时,住房紧张,手头拮据,可是人来客往总是有的。为了摆点卖相,拿出些许碗碟,放些长生果、香瓜子之类待客必不可少,有时还要到食品店买上半斤什锦糖,将包着玻璃纸的糖果挑出来,放入糖果盘子里,这样一来,在客人眼里满眼都是高级糖。那时石库门里尽管是蜗居,但不少人家的门背后都放着一张可拆叠的圆台面,到了大年三十夜,圆台面摆出来,家庭主妇就靠着一个烧煤球或煤饼的小炉子变戏法般地烧出一顿家人团聚的年夜饭。平时即使再不济,请客人在家吃饭,圆台面大,可上桌的菜少,就到附近的熟食店里买两只有点台型的菜来,只听到隔壁的阿婆操着宁波腔的上海话张罗着:小菜吃啥,饭要吃饱哦。有时候家里来了不速之客,来不及准备饭菜,下碗面待客,匆忙中不会忘记切点香肠,让光面里添点荤腥。这些都是上海人默认的台型底线,是低调中的腔调。做事体讲究台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至少不能比人家做的差,这是深入到上海人骨髓里的理念,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眼下上海又处在抗击疫情的前线,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一手抓复工,一手还要抓防控,而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动态调控等一套做法就是上海要守住的台型。人要面子树要皮,要面子总比不要面子好。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好,当然,面子和“夹里”都有,就更好了。

今天北京的天气好得不得了,推开窗,只见阳光将天空照耀得特别的通透,湛蓝湛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我突然又发现,树叶纹丝不动,这地上也没有一丝风。甚至连平时热情非凡的虫鸣鸟唱都没有了,四下竟没有一丝声音。这世界于此时静好极了。静好得让我在窗前发呆了好一阵子。发呆好。现在就有这样的说法,人过六十了,最好每天都有点时间发发呆,算是静养。其实,人老了就会发呆,君不见街头巷尾,村口路边,树下门前最常见的一景就是有人在发呆。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叫眼里所觅,满满回忆,心中所



早春的若尔盖花湖 (油画) 张韵帆

发呆是一种境界

郝郁剑

想,满满过往。老人也许于此时在思念遥远的童年、故去的父母、爱人与挚友;也许是在盼望远方归来的儿孙啊……昨晚我夫人将几天前我已看过的96岁的大画家黄永玉先生手写的他,他98岁的夫人去世的讣告给我看了。让我再度不胜唏嘘。认识黄先生是在近四十年前,我的“姑妈”郁凤介绍。说来有点话长,郁凤姑妈与丈夫黄苗子皆是当代的大画家大艺术家,她还是大文豪郁达夫

的侄女。不过我与她只是同宗同姓而已。我们在相识多年后她有一天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说:“你以后不能再叫我先生、阿姨了,你得叫我姑妈,因为你父亲姓郁。”于是,我从此就改了口。年轻时的我喜欢集字,喜欢把四个字的成语拆了,请书画名家在四尺八裁斗方大的宣纸上一家写一个字。比如说忠孝仁义,其中我请了郁凤姑妈写了“仁”,苗子姑夫写了“义”,请了他俩最

好的朋友之一丁聪先生写了“忠”。理所当然的,这个“孝”则想求得同样是他俩的最好友黄永玉先生的墨宝。但阴阳错差的总没缘分。后来,姑妈姑夫与丁先生都先后去世了,这心愿也就搁置下来了。

前几年的一天,黄先生的湘西老乡宋祖英妹妹邀我与陈道明一起去老舍人在京的万荷堂去看望他,我欣喜地把我的心愿和那另外三张斗方都带去了。老人看到那三位老友的墨迹,顿时发呆了好久,然后幽幽地对我说:“你这个姑妈是好人啊,就是脾气大,总喜欢与我争执问题。常常是在争得不分胜负、不可开交时,她甩门而去。但她也可以在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后,突然推门而至,说,刚才你是你对了,我错了,然后又甩门而去了。”“后来她走了,没有人再与我争执了。现在啊,只要电话一响,我就常常想,是郁凤来电话了,是你姑妈从那边给我来电话了呢……”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泪流满面。我亦然。写到这,我又有点发呆了。发呆其实是一种境界,它与“难得糊涂”一样,同是一种境界。

百岁母亲和五任保姆

刘勤生

我母亲今年101岁,先后有五任保姆,都说找保姆难,找个好保姆更难,百岁母亲和五任保姆的相处破解了这道难题。2000年我父亲不幸脑梗,母亲让我找来了第一任住家保姆小杨。小杨来后第一天,母亲叫上她一起吃饭,她不好意思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她很快被母亲的善良和宽厚所感染。她不识字,但学着在

药盒上画个简单记号便于按时给父亲吃药。她跟着母亲学会了做北方馒头、饺子等面食,也学会了烧地道的上海菜。六年后因女儿生孩子催她回去,临走前她和母亲依依不舍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第二任保姆小王是高中毕业生,悟性很高,性格直爽,干活麻利,除照顾我父亲外,空下来便会和母亲说东道西。由于她儿子从小患病影响读书,母亲建议她把儿子叫来上海治病。母亲让我出钱在华山医院挂特需专家门诊。这事令小王和她家人非常感动。由于她儿子的病时好时坏,不久辍学在家,小王在陪伴母亲二年多后,不得不回老家照顾儿子。第三任保姆是五十出头方姓女士,她第一次走

进家门见母亲午觉刚睡醒准备起床,立马放下行李帮母亲找鞋子穿上,这一情景让母亲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小方曾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有点医学常识。她认真阅读母亲用过的说明书,细心观察母亲的身体,及时调整用药。老母亲因九十多岁,渐渐显现出老年人常有的糊涂状况,方阿姨总是十分耐心地应答母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把老母亲照料得开开心心。2016年我们为她办了六十岁生日并送了一条金项链作为礼物,那天方阿姨动情地说,这是她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小方照顾了母亲整整八年,和母亲朝夕相处如同母女,后因方阿姨的媳妇生孩子要她回去照顾,临走时方阿姨眼含泪水依依惜别母亲。第四任保姆小顾没进过校门也不识字,第一天进门看到九十八岁母亲慈祥的样子就有一种亲切感,由于她讲话的安徽宿州口音和母亲的青岛家乡话有点接近,她们的交流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小顾经常和母亲唠嗑,有时拿着识字卡片请母亲教她识字,二年多来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顾五十岁时我们也给她做了生日,她在上海的两个女儿和从老家起来的老伴一起庆生。后来由于大女儿生孩子,小顾不得不离开母亲赶回老家照顾儿孙女。现在的第五任保姆小季照顾母亲也已快两年了,小季老实勤快心态好,照顾母亲尽心尽责。由于小季基本上掌握了母亲的表情和一举一动,现在能很有规律地安排母亲每天的饮食起居,使母亲过着有条不紊的安静生活。我们子女也替母亲做了些让保姆们难忘的事,早年小杨的儿子结婚,我们兄弟特地赶到安徽南陵参加其婚礼;方阿姨儿子为了订婚购房,我们预支一些工钱帮她解除些后顾之忧,又去安徽繁昌参加她儿子婚礼。三弟前些年出差安徽,特意绕道去黄山看望小王的父母。所有这些令保姆和她们家乡的亲友感动不已。



夜光杯

巴黎人的清晨,多从一杯咖啡开始。上可颂可不吃,但咖啡必须端上的。一小杯意式浓缩咖啡,夹着书本杂志或者文件,或是三两人聚集在公司楼道入口,喝完这一杯,一天的工作才算是开始。“早上九点,下午四五点,或是午晚餐后配着甜点,都是喝咖啡的好时间。”皮埃尔如是说。咖啡是社交。咖啡时间点和时间间隔的不同反映了聊天对象的关系和聊天内容的类型。一般来说,假期结束工作日第一天上午的咖啡时间是重要的,寒暄重点除了假期生活,还会落在同事八卦业务吐槽上。15至20分钟的短暂交流足够使精神状态迅速恢复到工作小群体中。而与之对应,下午茶咖啡时间就会漫长,并且非客套许多。和友人在咖啡馆里浪费午

后时光是巴黎人极其重要的日常。我通常偏爱加了奶的拿铁或是卡布其诺,可对我的法国朋友来说,加了奶的咖啡就失了灵魂。萨玛和我会约在双方住址折中的地方。萨玛喝咖啡的样子非常可爱。她点一杯意式浓缩,先喝一口水醒醒味蕾,再嗅一嗅咖啡的香气,“啊,很不错的样子,颜色也清亮”。然后她抿一小口,品一品,“还行,有点酸了”。一边说一边放入一小撮糖。于是,我俩聊学业,聊友人,聊未来;有时讨论剧本或是画作该如何创作,有时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看看巴黎春天的阳光和花朵,那些悠闲的鸽子在周围走来走去。若是重点冲着咖啡或是咖啡馆,咖啡本身的质量或是咖啡馆的功能以及环境,就是重

点考虑的因素了。比如在炎热的夏日,能找到一家做地道冰镇的咖啡馆可不容易,毕竟巴黎的夏天,是mojito和spritz的天下。可是,歌剧院旁边的telescope就能神奇地做到。这家店

在巴黎喝咖啡

杨麒民
里咖啡的苦味并不是那么重,还留有豆奶的香气,令我向往。日常在家中我也喜爱自磨咖啡,会挑选质量优良的咖啡馆购买咖啡豆。卢浮宫旁边的Cafe Verlet就是一家过百年历史的咖啡馆。从1880年起,店主就使用世界上最好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在店里直接烘焙酿造。在这家店能找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肯尼亚、泰国、

巴拿马、危地马拉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咖啡豆。若是要在店内品尝,店主从全球精选的咖啡豆在店内直接烘焙,咖啡的味道也是柔和醇香,层次丰富。我则偏爱Matamata Coffee,因为是加了奶的咖啡。我的朋友Gerald从澳洲旅行回来后就对澳大利亚的咖啡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去修习了咖啡课程,之后便成了一个拿铁咖啡艺术家。大多数时候,咖啡馆作为一个优秀的办公场所,环境成优先之选。自上个世纪起,流落在巴黎的诸多文艺人士就把咖啡馆当作他们第二个办公室,比如花神、双叟,这两家法国著名的咖啡馆相互竞争、相互扶持,是文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上个世纪的花神咖啡馆,海明威、加缪、毕加索、

波伏娃等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多流连于此。当然,自1933年以来每年都会颁发给法国小说的双叟文学奖,使双叟亦名声赫赫,两家咖啡馆就像交互诉说着法国人文思想与艺术史。如今,很多受新兴一代选择的咖啡馆远离闹市区,坐落在玛黑或是拉丁区这样的艺术或是文化区。有的里头是几个世纪的家具或是挂画,有的里头像是图书馆直接辟出了一个看书点——而这些馆子的外观,通常十分朴素不引人注意。这些年轻人,从工作室或是从学校出来,转头进小巷子,推开一扇木门,就进了另一方天地。牛看到它们以前的家变成咖啡馆,会不会笑出来。

十目谈
咖啡时光
责编:杨晓晖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